

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的价值及意义

赵学勇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延安文艺”是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不仅是因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文艺”奠定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新方向”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后,却遭遇到空前的质疑和尴尬,“延安文艺”成为了一种逐渐被淡化、被忘却的历史记忆。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和重大意义。

“延安文艺”不仅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我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就会发现“延安文艺”更有其独特的价值。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发生了广泛的“左翼”文艺运动,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都遭到了挫折与失败,而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在进入延安之后,却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延安文艺”。可以说,其他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只有失败的经验,只有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成功的经验,这种成功使得中国的左翼文艺与其他国家的左翼文艺乃至整体上的“文艺”不同。比如,我们可以追问,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正因为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经验,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我们也会遇到或提出新的命题,比如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什么人”的问题,比如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左翼文艺运动失败的国家是无法提出或者来不及提出的,而在中国,不仅提出了这些命题,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折射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生命史,现在看来,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可反思之处,但总体上它却是中国知识分子

对世界文艺的一大贡献。

以整体性的新文艺发展眼光来看,延安文艺在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更是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行过程,延安文艺显然承续了“五四”及二、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不少传统,但也形成了某些与之不同的要素。因此,如何看待延安文艺对此前左翼文艺传统的承袭,又怎样认识延安文艺自身的独异性传统的形成以及对于此后中国文艺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透过历史可以看到,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并不成熟,可以说正是在进入延安之后,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才逐渐成熟起来,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并在与抗战现实的结合中,在与大众的结合中,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发展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而建国后的“十七年文艺”又直接继承了“延安文艺”传统,如果将“十七年文艺”与“延安文艺”做一下比较,又可以发现它们也有所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与限制。因此要总结左翼文艺或当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延安文艺”无疑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延安文艺”的当代启示意义值得珍视。近代以来,传统的中国文艺及其体制逐渐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西方文艺为参照发展起了“中国新文艺”。但“新文艺”因为是“横向的移植”,缺乏本土资源与基础,一直未能解决如何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而为更广大的民众接受的问题。“延安文艺”是在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向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如果我们将延安时期开创的“人民文艺”与其他时期、其他派别的文艺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人民文艺”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任

何一种文艺思潮与创作,它是最切近中国经验而又最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创造。它是中国现代精英智慧与民间智慧的有机融合体。因此,当代中国文艺要有大的发展,也必须是在继承古典文艺、外国文艺的基础上,在与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在这方面,“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汲取。

文化(文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它的当代借鉴和启示意义。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延安文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过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难以割舍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对于真正认识“中国历史”、思考“中国问题”,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也正因此,延安文艺研究应该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现,并且成为一个全新的亟待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关于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的设想

王 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中国学术及其学术规范化意识的自觉与强调,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受到重视的延安文艺运动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其研究出版,都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并且为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及成长带来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延安文艺运动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或基本的文献学及文学史学的目的及范围,重视并强调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建设及其科学性与应用性的现实性及当下性意义等,充分显示出延安文艺研究领域的学术成长及其走向成熟,尤其是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意识的自觉发展及其突破创新,并且对延安文艺研究及其理论方法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及其影响。从而也昭示出了延安文艺研究及其新的拓展和发展趋向:即文献史料学的研究及其建设,将成为延安文艺研究及其学术未来成长发展过程中,真正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根本性途径及关键。重视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建设,已经成为延安文艺研究中广泛的学术共识及迫切的学术探索话题。

回顾新时期以来延安文艺史料学所取得的成绩,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批学者在经过积极地延安文艺运动文献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研究之后,先后组

织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延安文艺运动文献资料及专题资料汇编、作家研究资料专辑和史料专刊,以及在文艺史料通论及版本考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这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组织并作为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之一,于1983年4月出版的刘增杰等编撰的三卷本《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等延安文艺运动资料汇编外,随后也涌现出了由湖南文艺、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十六卷本“延安文艺丛书”,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二卷本《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以及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丹辉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等,以及艾克恩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王培元的《延安鲁艺风云录》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系列书籍、张鸿才的《延安文艺目录》等对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从而明显地改变了以往的延安文艺研究过程中,由于文献史料的缺少或有意无意的曲解史料等原因,给研究本身所带来的诸如论著证明不足或文献史料错误等学术“脆弱的软肋”等问题。

不过,作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延安文艺及其历史资源,实际上又是以其文学与